

城镇化建设下的农民身份转变研究：龙港案例

叶晓晓¹, 徐 达¹, 孙非寒²

¹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浙江 温州

²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温州

收稿日期: 2024年1月4日; 录用日期: 2024年2月2日; 发布日期: 2024年3月15日

摘 要

“离土不离乡”是龙港地区作为中国首个“镇改市”在早期实现农民身份转变的主要模式。研究显示, 身份转变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当地农民主要通过开创家庭工业和兼营工业等第二产业的方式, 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生计方式转变。也有部分农民选择专注于农业发展, 成为专业种植大户。此外, 农民的交易范围也有所扩大, 从村域扩展至县域, 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他们不再是小农, 而是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中。在交易对象上, 农民不仅与熟人进行交易, 还与来自周围村镇甚至其他省市的商人进行交易。交易中更注重合作利益、商品质量和商家信誉, 而非个人感情。本研究希望为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其他村落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乡村治理, 范式转变, 农民身份, 龙港, 乡村变革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Identity under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Longgang

Xiaoxiao Ye¹, Da Xu¹, Feihan Sun²

¹Personnel Department, Zhejiang College of Security Technology, Wenzhou Zhejiang

²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College of Security Technology, Wenzhou Zhejiang

Received: Jan. 4th, 2024; accepted: Feb. 2nd, 2024; published: Mar. 15th, 2024

Abstract

“Leaving the land but not leaving the village” was the main mode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for

farmers in the early days of Longgang, China's first "from town to city" area.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local farmers realized their identity change from farmers to workers mainly by starting secondary industries such as cottage industries and part-time industries. Some farmers also chose to focus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became professional growers. In addition, the trading range of farmers has also changed, expanding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county and breaking away from their dependence on land. They are no longer small farmers, but have become a member of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In terms of trading objects, farmers not only trade with acquaintances, but also with merchants from surrounding villages and towns and even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the quality of goods and the reputation of merchants rather than personal feelings.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ther villages.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 Paradigm Shift, Farmers' Identity, Longgang, Rural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劳动力虽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业领域，但仍然选择留在乡村，专注于非农业生产。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为“离土不离乡”[1]。“离土不离乡”模式的特点在于，农业生产被部分或完全地转移到了非农业经营。这意味着，原本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利用他们的剩余时间，以兼营的方式投入到工业或副业的生产中。这种模式不仅保留了乡村的原始风貌，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以温州龙港为例，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劳动力转移的必然趋势。从过去以渔业和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模式，逐渐转向了依靠家庭经营的非农产业模式。在80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当地的农民选择兴办家庭工业或兼营工业，从而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专注于农业，成为了专业种植的大户。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单一模式，使得乡村经济更加多元化和富有活力。这种模式的成功实践，也为其他地区的农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2. 农民生计方式转变：离土不离乡

(一) 农村家庭工业的兴起

在温州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经商的历史传统早已深植人心。即使在高度计划经济时期，手工业式的工商传统也并未完全消失。一部分温州人凭借着坚韧的意志和对商业的敏锐洞察力，始终保持着对手工业技术的热爱与经商的意识。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国家政策的推动为这部分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迅速捕捉到商机，率先进入工商行业。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人们，为温州的工商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辉煌，更是温州经商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扬。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使得温州在工商行业中崭露头角，成为国内外瞩目的商业重镇。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龙港地区的农民在工商领域面临着创业的挑战。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无法承担大型现代化机器设备的费用，因此，他们选择了一些技术门槛较低的项目。这些农民展现出了极高的创新精神，他们巧妙地将现代工业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相结合，使得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得以在家庭生产中实现，从而在龙港地区迅速发展壮大。以塑料编织袋的生产为例，如果使用圆织机，每台需要 6000 多元，而使用传统的木织机每台仅需 100 元。这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让农民能够以更低的资本进入工业领域。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塑料编织袋生产刚刚进入温州农村时，是以村集体形式出现的。但由于采用了木织机生产，其最低的必要资本量很小，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能力投资。因此，不久之后，小规模的家庭企业就取代了集体企业。这一变革不仅降低了创业的资本门槛，还激发了农民的创业热情。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成功地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工业生产相结合，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2]。在家庭工业技术的引领下，现代工业技术的复杂性被巧妙地化解，降低了农民进入工业领域的门槛。这些简单而实用的技术，如同初升的阳光，照亮了农民们的学习之路。他们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工业技术的传播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使得技术得以在乡村之间流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农民们通过相互学习、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一个个小村庄逐渐崛起成为专业化产业集群。家庭工业技术在降低技术壁垒、促进农民进入工业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生活质量，还为乡村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工业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创意和专业精神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工业化的进程。

在创业的萌芽阶段，大部分企业尚处在家庭作坊的形态，这其中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家庭工场阶段，这是龙港建镇初期最原始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利用简单工具或设备，手工完成大部分工序，劳动力主要来自家庭成员，只有少数是帮工或学徒。这些企业主要生产零部件或半成品，并直接销售给市场。例如，龙港人民北路一带的毛毯包装袋加工，至今仍保持着这种传统模式，飞鸿毛毯加工厂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企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家庭工厂阶段。这个阶段的企业规模有所扩大，投资增加，开始采用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设备，有的甚至拥有完整的生产线。但大多数企业仍只专注于一道工序，而将其他工序外包给其他企业。这种模式让具有产业相关性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聚集在一起，通过市场和分工协作完成产品生产。“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不仅促进了专业分工的形成，还让知识和信息得以流通。在这样的环境中，农民的素质得到提高，见识得以增长。公平竞争和集体协作意识逐渐形成，农民的人力资本得以积累。同时，这种模式也弥补了农民对于市场需求信息的不足。它不仅推动了自身行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进步。在行业专业化和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得到了有效吸纳。

在再生纺织产业的领域中，龙港南面的宜山地区堪称其发源之地。然而，由于其技术含量的局限性，这一产业在传递到龙港农民手中的时候，大多以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形式存在。例如，制作一条腈纶毛毯，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加工程序。这其中，各种专业市场起到了将不同的加工户串联起来的桥梁作用。开始时，专职的购销员会从外地采购回碎布原料，然后经过分拣、清洗和晾晒等环节，再拿到市场上出售给专门的毛毯加工户。接下来，毛毯加工户、版样设计户、拉毛户和包装袋生产户会协同合作，完成织毯、拉毛、复合、剪裁、缝边和包装等一系列工序。这样，一条毛毯的制造过程才算大功告成，随后会被拿到毛毯市场上进行销售。同样，在其他产业中，这种以各种专业市场为核心，不同加工户共同完成某种产品生产的模式也十分普遍。在温州的广大农村地区，这种以家庭小企业为基础的产业群落现象尤为显著。它们不仅展现了当地经济的活力，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地方特色和产业优势[3]。

此时，部分龙港农民选择脱离农业领域，将更多的资源，包括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到家庭工业

生产中。在家庭工业起步阶段，由于其操作流程相对简单，且员工多为家族成员，彼此间的配合默契度高，工作积极性强，这使得各生产环节在空间转移上的效率大大提高。这种集中的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家庭工业的起步和发展。

同时，家庭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生成性人才逐渐向经营管理型人才发展。一些具有天赋的农民通过学习和掌握新技能，逐渐从传统农业领域向更广泛的领域拓展。这些新技能不仅随着职业和地域的变迁在社会中传播，而且这些管理技能和观念的学习也影响了他们的子女和周围人群，为他们的社会身份转变奠定了基础。随着专业化的进程，人们的经营和生产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市场经济观念逐渐树立起来。基于利益驱动的观念转变使得市场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加速了龙港农民的身份转变步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龙港农民的身份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但他们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未能完全摆脱农民身份的标签。

(二) 农户兼营第二产业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商业的不断发展，龙港人民已经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不再仅仅依赖渔业和农业为生，而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拓展到其他产业领域，以增加收入。同时，他们的交易范围、交易空间以及交易对象也不再仅限于家庭成员之间。

部分农民仍以土地为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兼营工商业，包括农产品加工和农业产业服务。然而，他们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据调查结果显示，约有 15% 的农户表示未来打算只从事纯农业生产，但由于在外生存困难且生活成本高，他们面临挑战。另外，许多农民利用非农业收入购买农业机械设备，以提高农作物效率。他们希望通过土地流转承包更多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实现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经营。

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包括农产品销售、加工以及一系列农业产业的中、后服务经营。同时，他们也继续经营土地并从事农业生产，其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工商业。这些以工商业为主的兼业农户通常会将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或者直接转让给其他人，或者由家中老人耕种，甚至任其荒废。在劳动力素质方面，以工商业为主的兼业农民的平均劳动力素质较高，其中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比例要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兼业农户。这些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常年从事工商业经营，只有老人或妇女从事农业生产。

在调查中，当询问“将来是否继续经营土地”时，超过 70% 的兼业农户表示他们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农户所在的村落已经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发展工商业被视为提高农民收入更有效的途径。在这种背景下，农业成为了副业，只有老年或无力经营工商业的农民才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另外，也有农民选择从事家庭工业，进而积累资本投入纺织服装、塑料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农户不再局限于自己的主导产业，而是开始开拓其他产业。为了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资金技术成本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从而积累城镇经济活动的初始资本，逐步扩展了城镇自身经济活动的空间与能力。龙港农民将目光投向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以实现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表 1 呈现了 1987 年~1989 年龙港镇第一、二产业结构变化[4]。

根据表 1 数据显示，从 1987~1989 这三年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以及从业人员均呈现增长趋势。然而，第二产业在这期间的增速明显快于第一产业。产值从 6906 万元迅速增长至 23202 万元，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的产值与就业人数也高于第一产业，成为龙港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导产业。在第二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纺织服装和塑料业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成为主导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活动导向所决定的。这也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龙港城镇化的主导产业和主要驱动力。

Table 1.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dustries in Longgang Township, 1987~1989
表 1. 1987 年~1989 年龙港镇第一、二产业结构变化表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合计		
		1987	1988	1989	1987	1988	1989	1987	1988	1989
产值	数量(万元)	1677	1173	1290	6906	15,100	23,202	8586	16,273	24,492
	百分比(%)	10.5	2.96	2.45	43.3	38.16	42.10	100	100	100
从业人员	数量(人)	3389	3558	3914	4199	5184	7258	7588	8742	11,502
	百分比(%)	22.7	19.5	16.61	28.2	28.4	30.80	100	100	100

龙港地区的商品经济发达，流通渠道健全，是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有五个的所在地。第二产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由于资金技术成本较低，从而积累了城镇经济活动的原始资本。

(三) 种植专业户

在 80 年代后期，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各乡村为提高粮食产量，逐渐从单纯的耕作制度转向引进良种、植保、合理施肥等单项技术，并逐步将这些技术进行组装配套。其中，模式栽培、配方施肥、良种丰产示范坊和示范片等方法效果显著，促使许多农民成为种植能手。从表 2 中可以看出，龙港镇已经出现了一批规模种植的专业户，他们的种植规模约为 60 亩。进入 90 年代，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部分农民开始从事商业或企业生产，将土地转包给懂技术、能经营、善管理的种植能手(种植大户)。这促进了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形成了从小面积的十几亩、几十亩到大面积的近百亩、超百亩的种植规模。其中，童处村的周世东农场面积最大，最初为 116 亩，2001 年发展到 240 亩。从农业专业户的出现到种植(养殖)大户的发展，乃至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这种一家一户的自给性生产逐渐转变为商品性生产，为交易的扩大和市场扩展创造了条件[5]。初步统计显示，2001 年全镇有 44 户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农户，他们经营的面积超过 50 亩，总种植面积为 2828 亩[6]。

Table 2. Large grain growers with more than 50 acres in Longgang Township in 2001
表 2. 2001 年龙港镇 50 亩以上种粮大户

所属办事处	姓名	面积(亩)	所属办事处	姓名	面积(亩)
海城二河农业园村	傅化朋	58.7	湖前童处村	周世东	240.0
海城新洋农业园区	缪钦定	72.3	湖前李庄站村	钱贤赞	58.0
海城海下农业园区	陈志井	51.8	湖前西桥村	陈思环	66.9
海城前东农业园区	陈维高	57.9	湖前西桥村	章志灯	53
海城民主农业园区	陈仁平	52.6	湖前西桥村	章志侃	53.7
海城朝北处农业园区	缪可除	57.3	湖前西桥村	章志峰	58
湖前三垟村	薛成快	50.3	湖前西桥村	黄定俊	56.9
湖前三垟村	梁祥聚	53.7	江山平桥村	周志区	51
湖前水深村	杨孔棒	53.6	江山寿山村	蔡克晓	58.6

续表

湖前水深村	杨师周	98.4	江山西河村	马红行	63
湖前麟头村	谬信软	95.2	江山东庄村	陈亦标	52
湖前麟头村	姜潮利	76.1	江山东庄村	金增远	53
湖前凤江村	洪成相	52	江山三大庙村	张美水	57
湖前凤江村	洪成相	78.3	江山都口村	吴昌旺	52.5
湖前凤江村	吴春金	82.0	江山周家车村	薛奎欲	57
湖前汇龙村	陈绍利	82.1	江山周家车村	黄朝五	55.5
湖前汇龙村	陈敏锐	53	江山月星村	张可耀	52.7
湖前新光村	刘光喜	53.2	江山三大庙村	徐必良	55.6
湖前新光村	陈思肖	58.6	江山进贤村	李中孀	54.6
湖前新光村	何必统	55.5	江山西河村	龚锦平	53.9
湖前新光村	陈思寿	59.0	湖前东河村	沈义放	82.0
湖前新光村	陈思统	46.8	平等徐家庄	徐登稠	55

注：1) 名字按社会学方法做处理。2) 周世东农场湖前童处村，系个体承包的家庭农场，创办与1998年1月，农田面积116亩，以种植水稻为主，种甘蔗、荸荠等经济作物的综合经营户。从业人员平均夫妇2人，忙季雇佣临时工若干人。

3. 农民交易空间转变：从村域到县域

(一) 传统集市

“庖羲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7]，这是最早记录乡村集市的记载。传统乡村社区展现出一种原子化的结构特性，其构成基础是众多同质化的家庭单位，这些家庭单位汇聚形成同质化的村落。在村落的经济体系中，每个家庭都被视作独立的经济单元，体现了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特性。在这种自然组织状态下，农户间的经济活动缺乏有效的整合与协作。由于每个家庭都能实现自给自足，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有限，只有那些无法自行生产的工具和物品，他们才会选择购买。而在交换过程中，往往使用自家生产的农产品作为交换媒介。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物物交易的现象在江南地区的农村仍普遍存在。这种交易形式逐渐演变为为了市场交易，形成了具有农民社会或农耕社会特征的市场结构，从而将集市视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体系[8]。

有研究者将集市定义为：集市是定期聚集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场所，最初是由于商品交换而成[9]。在乡村社会中，由于人口居住较为分散，集市成为农民进行交易的重要场所。集市将周围的农民聚集在一起，使交易空间相对集中。在乡村的集市上，人们依靠长期以来的约定俗成的规定进行交易活动。例如，某些集市按照农历逢三、逢六、逢九进行，还有的地方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会市。在龙港建镇之前，各地就存在一些定期的集市，如刘家店会市、缪家桥会市和方良村会市等。1982年后，随着政府放宽经济政策，鼓励农民在龙港兴办实业、个体经商和家庭工业等，乡镇个体工商户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促使龙港村村民开始有多余的农副产品需要到集市上出售。同时，村民的多样化需求也推动了乡镇集市的繁荣。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村民们带着自己的商品前往集市交易，或者利用集市购买所需物品，补充家用。每年这些大型集市都是人山人海，不仅满足了村民的购物需求，也增进了农民之间的感情。在这样的场

合下，村民们可以交流家常、互走亲戚。通过集市这一社交场所，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为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做出了贡献。

(二) 专业市场

在乡村城市化的大潮中，人们的经济生活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龙港为例，自从建镇以来，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市场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龙港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个体都在围绕着市场进行经济活动。那些率先获得经济资源的进城者，成为了市场生态圈的基层生产者。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吸引各种供给者，从而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网络。镇区所在地的居民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创办了各种市场，如建材市场、食品市场等。这些市场为进城者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和劳务，同时也为周边乡村的工匠提供了展示自己技艺的机会。例如，当地的木匠、石匠和油漆工等手工艺者纷纷涌入城市，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各种服务。与此同时，进城者也围绕着市场需求，开展各种经济活动。他们不再依赖土地生活，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而是成为了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一员。通过参与市场竞争，他们逐渐融入了城市经济体系，成为了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在龙港镇成立后，人口的汇聚形成了庞大的交易网络。居民们不再遵循特定的交易日，每一天都充满了频繁的商业活动。天色未亮，龙港腈纶纱市场就已热闹非凡，纺纱户和织毯户们早早地来到市场，热切地交流和交易腈纶纱。一位受访的织毯户解释了为何他们如此早到市场，她告诉记者，若稍晚到达，优质的腈纶纱可能就会被抢购一空，那样工人们就会因为没有足够的原料而停工^[10]。开始时，市场的交易规模尚小，百来人的交易量还能被妥善容纳。然而，随着毛毯业的繁荣发展，交易人数激增至 300 多人，交易额也从 10 万元飙升至 300 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原有的市场场地显然已无法满足需求。于是，道路两侧直至龙华饭店门口都摆满了摊位，市场的扩张甚至引起了交通拥堵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场的管理方于 1991 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市场迁移至皇后路高氏祠堂南首。市场的迁移，象征着龙港经济活动和市场化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农民们不再仅满足于在集市上进行消费，他们开始发展家庭工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往城区市场，甚至远至其他县市。在 90 年代的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进一步将自己的产品消费从本社区中分化出去。他们以满足市场上陌生消费者的需求为宗旨，通过商人这一中介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因此，农民的交易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固定的集市发展到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活动。这吸引了周边村镇的农民纷纷来到龙港进行消费或商业交流。这种转变不仅推动了龙港的经济发展，还加深了市场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产品价值的实现与竞争机制的展现都离不开市场的交换。龙港镇在探索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深谙流通领域的重要性，并以此为起点，逐步建立起一系列专业化的市场。以 1993 年为例，龙港镇的贸易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多达 24 个。这些市场涵盖了服装、腈纶毛毯、腈纶纱及腈纶布角、木材、钢材、水泥、小商品、水果、水产品以及纺织品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化特色。这些市场不仅覆盖了全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甚至还将商品远销海外。以服装市场为例，它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式服装，无论是传统款式还是时尚潮流，都能在这里找到。各种品牌、各种风格，竞争激烈，推动了服装行业的创新与发展。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推动了市场专业化的发展，使得龙港镇的服装市场逐渐成为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知名市场。同样，腈纶毛毯市场也具有非常高的专业化程度。这里不仅有各种规格、质地、花色的腈纶毛毯，还有各种腈纶纱和腈纶布角等原材料。这样的专业化市场为生产商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交易平台，促进了商品的快速流通。而在木材市场，从国内外各地运来的木材琳琅满目，满足了不同客户的需求。钢材市场、水泥市场等也都是如此，它们凭借着丰富的品种和优质的服务，吸引了来自各地的采购商。这一时期，龙港镇的小商品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各种新奇的小商品层出不穷。这些小商品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蕴含了创新和创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它

们的流通范围也相当广泛，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市场。不仅如此，水果市场、水产品市场以及纺织品市场等专业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也都展现出龙港镇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的远见与决心。它们共同构成了龙港镇的商品经济体系，为全镇乃至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这些市场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与交换，更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各个商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纷纷加大创新与质量提升的力度，进一步推动了全镇经济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这样的良性循环，龙港镇的商品经济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全国商品经济的一大亮点。

4. 农民交易对象转变：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彼此熟悉、相互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熟人社会中，宗族力量通常较强，人们聚族而居，地缘关系依附于血缘关系。村庄内的人们通常具有较强的自己人认同，他们认为属于同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与此相反，村庄以外的人们则被视为陌生人，与村庄内的人们缺乏了解和信任[11]。在乡村生活中，由于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小，人们往往祖祖辈辈居住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网络的特点是高度的透明度，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在乡村社会中，家庭成员、邻里和同乡之间的关系是最为熟悉的相处模式。由于社会的流动性相对较小，农民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稳定。举个例子，在赶集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互相认识，即使不是亲戚关系，也是乡亲。当某家有红白喜事时，全村人都会互相帮忙。比如遇到生小孩的情况，一些礼品要分遍全村，还要请大家喝喜酒，以表庆贺。这样的传统习俗在乡村社会中非常普遍，强化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和认同感。

在现今的龙港，我们见证了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的蓬勃发展。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来自三个省份和七个县，彼此之间没有像农村地区那样错综复杂的血缘和亲戚关系。他们操着不同的方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拥有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背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主要由各种异质化的个体所构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龙港的家庭工业迎来了飞速的发展，许多农民投身于小商品生意，逐渐形成了交易市场。这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居民，也吸引了众多外地顾客。例如，沿河家具一条街汇聚了60多家家具店铺，生意兴旺，繁荣昌盛。另一边的副食品专业街，有170多家经营户专门从事副食品的批发和零售[12]。这些店铺不仅满足了周边地区的需求，也大大缩短了购物时间，为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能人”们也纷纷从周围地区前来进货，他们在龙港采购商品，然后在本地进行销售。这样一来，不仅满足了周边村庄对生活品的需求，也大大缩短了购物的时间和距离。这些“能人”们凭借他们的商业智慧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为了这个移民城市中的商业佼佼者，推动了龙港的商业繁荣。

龙港，这座昔日的小镇，如今已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商贾云集之地。每天，熙熙攘攘的人流涌动于街头巷尾，各地的客商纷至沓来，络绎不绝。然而，当地居民并不满足于被动地等待商人的造访，他们渴望将自己的商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当地政府审时度势，积极筹划。每年，他们都会举办数场物资交流会和产品展销会，为商人们搭建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这一举措不仅扩大了龙港的影响力，吸引了众多外来投资，而且进一步推动了贸易市场的发展，加速了商品的流通。此时，龙港的商贸活动呈现出一种新的景象：尽管交易的频次增加，但人们之间的关系却逐渐变得疏离。在市场的交往中，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合作利益、商品质量以及商家的信誉，而不再受个人情感的左右。交易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熟人圈，而是扩展到了周围的村镇乃至其他省市的商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的交换原则变得简单而直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时结算成为了主流[9]。有时，为了争取更好的价格，商人们甚至会激烈地讨价还价，面红耳赤。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自身的利益。这些活跃的贸易市场不仅增加了农民的交易频次，还使得买卖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与此同时，交易的空间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固定的地点，从而呈现出一种开放而多元的态势。

参考文献

- [1] 张仁寿. 温州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考察[J]. 浙江社会科学, 1995(3): 21-26.
- [2] 黄宗克, 梁世盛. 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J]. 中国方域, 2001(6): 31-34.
- [3] 辛仁周. 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转移方式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取向[J]. 财经研究, 1994(12): 23-26.
- [4] 徐天琪, 叶振东. 中国农民城市化的新模式[J]. 中国人口科学, 1994(3): 49-53, 60.
- [5] 张曙光. 分工、交易和市场化[J]. 南方经济, 2014(11): 93-99.
- [6] 徐启豆, 陈绍雄, 等. 龙港镇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222.
- [7] [清]李道平. 周易集解纂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537.
- [8] [美]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史建云,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0.
- [9] 陈浩天. 交往社会化: 农民交往世界的变迁与秩序重构——以豫东林楼村为例[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 [10] 李金珊, 胡凤娇. 三十岁的城市: 龙港的孕育、诞生和发展[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30.
- [11] 贺雪峰. 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 南京师大学报, 2011(4): 20-27.
- [12] 顾益康. 对温州模式的重新思考[J]. 浙江经济, 1986(8): 5.